

北京历史文化学术讲座

远古至秦统一前的北京

王彩梅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北京社会函授大学辅导部 联合主办

1986年10月 · 北京

目 录

第一节 远古时期的北京	(1)
一、北京地区最早的开拓者	(1)
北京人(1) 新洞人(2)	
二、北京地区的古代人类(一万八千年前至四、五千年前)	(2)
山顶洞人(2) 东胡林人(3) 上宅和北埝头遗址(3)	
雪山遗址(3)	
三、北京远古的传说	(3)
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3) 幽州、幽都和幽陵(4)	
第二节 夏商时期的北京	(6)
一、夏商时期北京地区的居民	(6)
夏家店下层文化(6) 古燕国的历史考察(7)	
二、夏商时期北京地区的经济	(8)
农业和畜牧业(8) 手工业(8)	
第三节 西周春秋时期的燕蓟古城	(9)
一、武王灭商与周初封燕	(9)
周初分封与燕国的建立(9) 琉璃河商周遗址与燕国始封地(9)	
燕地古城遗迹(11) 燕与蓟(11)	
二、西周时期燕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12)
青铜器(12) 漆器(13) 玉石蚌器(13) 西周带字甲骨(13)	
三、西周时期的奴隶殉葬墓	(14)
四、春秋战国之际的山戎遗迹	(15)
第四节 战国时期燕都蓟城的兴盛与衰落	(16)
一、战国初年的燕国	(16)
二、燕国的强盛	(17)
燕王哙让子之(17) 燕昭王励精图治(18) 燕国的疆域(20)	
燕国的长城(20)	
三、燕国的衰落与秦灭燕	(21)
田单破燕(21) 燕国在燕赵战争中的失败(21) 荆轲刺秦王(22)	

四、燕地蓟城的经济发展·····	(22)
农业 (22) 冶铁业 (23) 青铜器、金银器 (24)	
城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24)	
五、燕地各族间的友好往来·····	(25)

远古至秦统一前的北京

第一节 远古时期的北京

一、北京地区最早的开拓者

“北京人” 在我国辽阔的大地上，人类生存的历史大约已有一百七十万年。在这一百多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北京地区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

经考古发掘表明：举世闻名的“北京人”，正是目前所知道的北京地区最早的开拓者。“北京人”活动的时代距今约七十——二十万年前，这说明今天作为我们伟大祖国首都的北京，早在七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广阔的土地上，而著名的“北京猿人之家”就座落在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的龙骨山上。这座小山位于北京西山东南部山脚下的一个山环里，它西面和北面的西山，属于太行山脉的一部份。这里崇山重叠恰成为天然屏障，东北面则低丘环绕，而南面和东南面却豁然开朗，与微向东南倾斜的华北大平原衔接。在周口店和龙骨山中间隔着一条潮儿河，河水从山口流出。这条河沿着周口店西侧蜿蜒南流，到十余公里外汇入琉璃河。

根据考古学家探测，在周口店附近的山上，有距今四亿多年前的奥陶纪石灰岩，和距今两亿多年前的石炭二迭纪煤层。这里的石灰岩层很厚，被带有酸性的水溶解以后，很容易形成许多洞穴和裂缝^①。在远古时期，这些洞穴就成为古人类的天然栖息之所，“北京人”就是居住在这样的洞穴里。

“北京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是1929年12月发现的。发现的地点就是在龙骨山上一个比较大的洞穴里，已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

“北京人”在这里居住的时间很长，大约从七十万年前到二十万年前先后都有人类断断续续地在这里居住。

在“北京人”居住的洞穴里埋藏了内涵十分丰富的远古文化遗存。自从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发现后，经过多次发掘，先后发掘出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六具、头骨残片九块、面骨六片、下颌骨十五块、牙齿一百五十三颗、残破的大腿骨七段、胫骨一段、比较完整的锁骨一个、腕骨一块、月骨一块，经鉴定，这些骨骼分属于四十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从这些宝贵的资料中，我们了解到北京地区远古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北京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龙骨山上野生植物的资源很丰富，当时气候温暖，一年四季皆可采摘。他们采集植物的种子、果实、根茎等充饥，除采集外，还进行

^① 参见贾兰坡、黄慰文：《周口店发掘记》。

狩猎。与“北京人”同时生存的动物有肿骨鹿、斑马、羚羊、野猪等，他们依靠群体的力量也可捕捉到剑齿虎、犀牛等凶猛的野兽。

“北京人”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和木棒。在“北京人”居住的洞穴里发现的石器和石片约有十万件。根据形体和用途可分为砍伐器、刮削器、尖状器等。砍伐器主要用来砍伐树木、制作挖掘工具；刮削器主要用来刮削兽皮和切割兽肉、修理木棒等；尖状器是用石英石片加工而成，用来刮削兽皮和挖掘植物的根茎。尽管这些工具十分简陋，而“北京人”就是利用这些工具同自然界进行斗争，发展了生产，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在“北京人”遗址的洞穴里发现了很厚的灰烬层，还有不少烧过的石头、骨头。这说明“北京人”已能使用和控制火了。发明用火，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大事，火可以照明，可以取暖，可以熟食，可以抵御猛兽，增强了同大自然斗争的能力。恩格斯说：火的使用“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①。

“北京人”生存的时代，在人类经济文化史上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从社会发展来看，还处于原始社会初期阶段。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既没有发明衣服，也不懂得建造房屋，而是住在天然的洞穴里，过着群居的生活，被称为“原始群”。

“北京人”的生活很艰苦，因而他们的寿命很短，在已发现的四十个左右的个体中死于十四岁以下的即占三分之一。“北京人”就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以艰巨的劳动同大自然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才得以生存下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新洞人” 继“北京人”之后，在距今约二十万年至十万年前，居住在北京地区的古代人类是“新洞人”。

“新洞人”遗址是1973年在曾经发现“北京人”化石的周口店龙骨山上发现的。在这个遗址里除发现了十几种动物化石外，还发现了一颗人类牙齿化石，标本保存较完整。牙齿形态较“北京人”有所进步，据科学测定，其生存年代介与“北京人”与“山顶洞人”之间，定名为“新洞人”。属旧石器时代中期。

在“新洞人”的洞穴里发现了堆积较厚的灰烬层，其中有烧过的石头、石器、骨头和朴树籽。大量烧骨的存在，说明“新洞人”以动物为主要食物，结合灰烬层研究，证明他们的食物是以熟食为主的。

二、北京地区的古代人类（一万八千年前至四、五千年前）

“山顶洞人” 继“新洞人”之后，在距今一万八千年前，生活在北京地区的居民是“山顶洞人”。这是1933年在“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洞里发现的，当时发现有头骨、下颌骨残片、脊椎骨、枕骨和零星牙齿化石，分属于八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定名为“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的体质形态已经和现代人基本相同。在山顶洞人遗址中还出土了二十五件石器，最能代表山顶洞人技术水平的是一根骨针和装饰品。这些装饰品有穿孔的兽牙、海蚶壳、石珠、小砾石、青鱼眼上骨和刻道的骨管等。在山顶洞出土的骨针长82毫米，微弯，表面光滑，一头是锋利的尖，另一头是用极尖的利器挖成的针眼，这样一根精制的骨针，需要经过选材、刮磨、钻孔等工序才可完成，这是山顶洞人勤劳、智慧的结晶。骨针的出现，表明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山顶洞人已经能够缝制衣服。装饰品的出现,说明山顶洞人的生活更加丰富,他们已经懂得为美而打扮自己了。另外,在山顶洞人尸体的周围撒布有赤铁矿粉,可能同原始的宗教萌芽有一定的关系。山顶洞人的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发展已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东胡林人” 到距今一万年前的时候,生活在北京地区的古代居民是“东胡林人”。1966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村,发现了一处古墓葬,经鉴定,其时代距今为一万年前,属原始社会末期。墓内埋葬两名成年男性和一名少女。尤其突出的是在少女身上有用五十多枚小螺壳穿成的项链和用七段牛肋骨穿成的骨镯,另外还有两件残破的蚌类制品。与以前不同的是,“东胡林人”不是在山洞里而是在平原的黄土台地上发现的,说明这时的人类已离开山洞来到平原上居住。

“上宅和北埝头遗址”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平谷县发现了上宅和北埝头两处古遗址。这是继“东胡林人”之后在北京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在全国的考古发现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上宅遗址位于平谷县城东北三十五公里上宅村北的一块台地上。遗址北靠燕山、南临沟河,自然环境十分优越,是古人类赖以生存的好地方。遗址面积约五千平方米,经过清理共出土陶器三百余件、石器二百余件,陶器以钵为主,呈深腹、敛口、圈底等多种不同形状,还有罐、杯、陶球之类。出土的石器以盘状器的数量最多,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几件装饰品,其中的石雕小猴制作极为精细,形象维妙维肖,可为石雕中的佳品。

北埝头遗址位于平谷县的西北方,燕山南麓的错河南岸,面积约六千平方米,这里发现十座半地穴式房屋遗迹,有些房屋面积的大小、布局还清晰可见。出土的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陶器的种类比较简单,均为手制。石器有石斧、石凿、石磨盘、石磨棒和盘状器、细石器等,当时人们过着定居生活。

考古学家根据上述两处遗址出土器物断定,它们的年代上限可能晚于磁山文化,下限则要早于仰韶文化。经碳十四测定,其绝对年代距今约为六千五百年至七千年之间^①。

雪山遗址 雪山遗址位于昌平区雪山村,这里依山傍水,土地肥沃,宜于种植与放牧。在这里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分为三个时期:雪山一期文化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距今约为六千多年。这个时期的雪山人已经掌握了制陶技术,陶器以红陶为主,如红陶罐、彩陶片等。这种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有相似之处,说明南北两地对当时北京地区都发生了影响。类似雪山一期文化的遗址,还有昌平区林场、马坊和密云县燕落寨等。

雪山二期文化约距今四千年前,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已属于原始社会的末期。这个时期发现的磨光黑灰陶双耳罐、折腹盆等,在制作技术上比以前有所提高。类似雪山二期文化遗址的还有昌平县的燕丹、曹碾等地。

雪山三期文化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其时代相当于夏商时期。

三、北京远古的传说

“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 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早在黄帝时期,今北京一带就有

^① 《光明日报》1985年2月3日。

人类活动了。传说当时除黄帝之外，还有炎帝、蚩尤等中国古代著名的传说人物，都曾经在今北京附近活动过。《史记·五帝本纪》载：相传，黄帝曾“居于涿鹿之阿”，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炎帝大败。黄帝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两次战争，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很著名的传说，其中提到发生战争的地点在涿鹿和阪泉。这两个地名在今何处，虽有不同说法，但有的史书记载其地在今北京附近。

黄帝战蚩尤事发生于何时，今已无法论定确切的年代，但据其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来看，大约距今四、五千年。可见，北京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亦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传说时代。

幽州、幽都和幽陵 在中国古籍中有不少关于幽州、幽都和幽陵的记载，其中最著名的是幽州。有一种流传比较广泛的说法，认为北京及其周围地区最早的名称叫作“幽州”，并认为这是从尧舜时期流传下来的古名。实际上，这也仅仅是传说，并不是真实记载的历史情况。

“幽州”之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约在战国时期。现存史籍最早记载“幽州”之名的有以下几处：

《周礼·职方氏》：“东北曰幽州”。

《吕氏春秋·有始览》：“北方为幽州，燕也”。

《尚书·尧典》：“流共工于幽州”。

《尔雅》：“燕曰幽州”。

在明确记有“幽州”二字的这几部书中，《周礼》和《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后期。《尧典》稍晚一些，可能是秦汉时期；《尔雅》是汉代的作品。由此看来，“幽州”一名的出现，最早也不会早于战国时期。

当时出现“幽州”之名，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与先秦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战国时期产生过一种学说，称为“九州说”。这个学说是当时人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地理知识，将全国土地划分为九个区域，每个区域称为一“州”，共“九州”，而“幽州”即是其中之一。最早提倡“九州”说的学者是驺衍，《汉书·艺文志》列有《驺子》四十九篇，《驺子终始》五十六篇，其书均已亡佚。关于驺衍学说的详细内容，现已无从查考。主张“九州说”的也不仅驺衍一家，现存古籍如：《禹贡》、《周礼》、《吕氏春秋》、《尔雅》等书都有关于九州的记载，然各书所记的州名并不完全一样。此外，在《史记·五帝本纪》和《尚书·尧典》中还记有“十二州”，但未列具体州名，影响也不大。

“九州”说，在当时只是一种学说，还不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应用的通行地名。作为“九州说”之一的“幽州”，也不是当时实际应用的地名。因此，将北京地区最早的名称定为“幽州”，是不确切的。

在中国历史上，“幽州”作为一个正式的地名来使用，那已是汉武帝时期。西汉以前，中国的地方建制并没有“州”这一级名称，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在全国设十三州部，幽州名列其中。这是幽州在北京地区作为正式地名的开始。

“幽都”、“幽陵”、“幽都之山”等地名，与“幽州”不尽相同。“幽州”乃是九州之一，而以上一些地名似与九州没有什么关系。

在现存史籍中，对“幽都”的记载比较多。“幽都”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个地名。《韩非子·十过篇》记载：尧在位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所出入者，莫不宾

服”。这是形容尧的统治范围很大，南方达到了交趾，北方达到了幽都，实际上尧的势力不会如此之大，这显然是以后世的地理概念附合尧时的情况。《史记·五帝本纪》载：“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和叔”是尧时治理北方之官。传说尧在位时，设有治四方之官，羲仲治东方，羲叔治南方，和仲治西方，和叔治北方，所以命和叔居于北方幽都之地，显然这也是传说。至于史籍中其他关于幽都的记载，基本性质也都与此类似。

此外，在古代神话中还将人死后所居之世界称为“幽”或“幽都”，如：《庄子·天运篇》：“……鬼神守其幽”。《礼记·檀弓下》：“望反诸幽，求诸鬼神之道也”。郑玄注：“鬼神处幽暗，望其从鬼神所来”。《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王逸注：“‘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称幽都”。

这里的幽都，皆指阴间幽冥世界，显然这只是神话传说中的地名。即使在儒家经典中所记的历史传说，也难确定其具体地点，如：孔安国在《尧典》“幽都”下注云：“北称幽……都所聚也”，并未明指其何地。宋蔡沈在《书经集释》中则使用以传说解释传说的办法称：“日行至是，则沦于地中，万象幽暗故曰幽都”。这是说幽都是个“万象幽暗”的地方。

此外，有的古代注释家们对幽都的具体地点也曾作过解释，但各家说法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幽都在雁门以北，如《淮南子·脩务训》高诱注云：“阴气所聚，故曰幽都，今雁门以北是”。有的认为幽都即指《山海经》中的“幽都之山”，如《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在解释“幽都”时说：“《山海经》曰：‘北海之内有山名幽都’盖是也”。而影响最大的说法还是“幽都”即“幽州”，或“幽州”、“幽都”、“幽陵”为一地之说。

此说的出现，与古籍记载歧异有关，如《尚书·舜典》云：“流共工于幽州”。此“幽州”二字各书所记不同，《孟子》、《大戴礼记》、《尚书》中作“幽州”，《庄子·在宥篇》作“幽都”（“流共工于幽都”），《史记·五帝本纪》作“幽陵”（“流共工于幽陵”）。尧舜时“流共工”之事，本是古代传说，其中的幽都或幽陵，自是传说中的地名，各书所记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当时传闻各异、所记不同的结果。而古代的注释家们并没有把这种记载当作传说看待，他们认为这是可靠的信史，因此，对各书所记歧异之处，就设法给以“圆通”的解释。当解释“幽都”时认为“幽都即幽州”，当解释“幽陵”时，也说“幽陵”即“幽州”。如《庄子·在宥篇》：“流共工于幽都”，成玄英疏：“幽都在北方，即幽州之地”。《楚辞·大招》：“北至幽陵”，王逸注：“幽陵犹幽州也”。根据这样的解释，幽州、幽都、幽陵三名自然就成为一地了。至于历史事实是否如此，各家均未进行论证，因此，其真实情况如何，今天亦难以断定。作为一项古代传说而言，各书所记难免有某些歧异之处，这是常见的现象，无须严格追究其历史的真实性。

幽都之名，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大约在唐代中叶。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设幽都县，其地在今北京顺义县西北，这是幽都作为正式地名的开始。在此以前，虽有幽都之名，但均属于神话和传说中的名称，不是人们现实生活中所使用的真实地名，因而不能实指其地。唐代幽都县的建立，才正式确定了幽都的所在地。可见，“幽都”之名是有一个从传说到现实的演变过程。

第二节 夏商时期的北京

一、夏商时期北京地区的居民

夏商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开端，北京地区进入奴隶社会大约也在这个时期。

当夏商王朝在中原进行统治的时候，在今北京及河北省北部地区，是北方各族的聚居地。南北两地的人民在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根据甲骨文的记载，早在商代时这里的居民要向商王朝交纳一定的贡物（如奴隶和马匹）。关于人们的活动情况，保存下来的文字资料很少，但在考古发掘中却发现了不少当时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这使我们今天有可能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作个初步的了解。

夏家店下层文化 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夏商时期北京地区的古代文化，主要是雪山三期文化即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是个地名，座落在辽宁省赤峰县境内。这个地方早在三十年代就发现了古代的人类遗存，但在当时并没有给它单独确定一个文化名称，而是将这类文化遗存归入“红山文化”的范畴以内。全国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于1960年在内蒙赤峰县（原属内蒙古自治区）夏家店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在这个遗址内包含着上、下两层不同的文化遗存。而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内涵又都拥有着自己的特征，应属于单独的文化系统。因此，将这处遗址的上层定名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其下层定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从时代上说，下层又早于上层。根据地层关系可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时代晚于龙山文化而早于西周，这个年代范围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经碳十四测定“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同类遗址，其绝对年代数据如下：

赤峰蜘蛛山遗址木炭：

距今 4360 ± 140

2410BC

敖汉旗大甸子遗址朽木：

距今 3645 ± 135

1695BC

敖汉旗大甸子遗址朽木：

距今 3685 ± 135

1735BC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涵复杂，分布面很广，北已越过西刺木伦河、南已越过拒马河、东至辽宁以西、西至北京以西即河北省的壶流河（河北蔚县）一带。已发现的重要遗址有：辽宁省赤峰、宁城、北票、朝阳，河北省承德、唐山、蓟县、大厂和北京的琉璃河、平谷刘家河、昌平雪山村等地。尤以京津地区、燕山南北一带为多。这些地区都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墓葬和文化遗物。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属于一个单一的族的文化还是几个族的文化？这是学术界非常注意的问题。但从目前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方面观察，都反映出“夏家店下层文化”不会是

单一的一个族的文化，而应是包含着几个族的文化。

从考古资料看，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分布的范围内，其文化面貌存在着很明显的地方性差别，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因此，有的人把它分为“辽西型”和“燕山型”，也有的以燕山为界分为“燕南类型”和“燕北类型”。尽管在类型的划分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应该划分为不同类型的。既然这种文化具有不同的类型，就有可能是不同的族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

从文献记载看，今北京地区及河北省北部和辽宁西部一带，在古代分布着几个不同的族和方国，其中包括肃慎、燕亳、孤竹、山戎等。在这几个族中，只是肃慎的地望还存在着一些有待研究的问题，因为有的人认为，肃慎原来处于河北省北部与燕国为邻，后来向东迁徙，进入吉林或黑龙江一带；也有的认为肃慎一直活动在东北黑龙江流域，并不是自河北省北部东迁过去的。这类问题还有待于今后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至于其他几个族和方国的地理位置，各家的分歧意见并不大。例如，孤竹国在今河北省卢龙一带，山戎族活动在燕山南北，燕亳处于今北京及其周围地区，这些都是有文献记载可以查考的。

以上可见，在夏商时期，居住在今北京地区的并不是单一的一个族，而是有几个不同的族相邻而居，共同生活在这里。这个情况说明，今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正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开发了这古老的土地，并使之日益繁荣和发展。

古燕国的历史考察 根据甲骨文和文献记载，夏商时期在今北京及其附近一带，分布着一些小国，其中有古燕国、孤竹国等。孤竹国在今北京以东，古燕国的地理位置在今北京市辖区的范围以内。

古燕国最早建立于何时，现在已难详考。但至迟在商代有关古燕国的情况，已可在文献和甲骨文中找到一些记载：

《左传》昭公九年云：“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这是周天子派詹桓伯对晋国说明周初北方疆界时的一句话。这里明确地提到“肃慎、燕、亳”早在武王克商之前就已经存在，他们是北方的居民。正因为如此，武王克商以后，才能成为西周的“北土”。其中的“燕”即为“燕国”，这就是指周初封燕以前活动于当地的古燕国。

这项记载说明：一、古燕国的地理位置在北方；二、古燕国在西周以前就已经存在。

此外，关于古燕国的情况还可从甲骨文中找到记载。甲骨文中有一“𤯔”字，是方国的名称，这个方国应该就是古燕国。

文献所记燕国的“燕”字，在金文中从不作“燕”，而是写作“𤯔”、“𤯕”或“𤯖”。如：“燕侯”、“燕王”的“燕”字，在金文中均作“𤯕”或“𤯔”，称为“𤯕侯”、“𤯔王”（见𤯕侯旨鼎、𤯕侯孟、𤯔王职戈、𤯔王喜铜剑、𤯔王喜铜矛等），是知燕国即𤯔国。这个“𤯔”字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写法，最早在甲骨文中写作“𤯔”，在西周、春秋的金文中写作“𤯕”或“𤯖”，在战国金文中写作“𤯔”。其变化规律是由简到繁，而“𤯔”字是“𤯔”字的最早写法，因此，如果说“𤯔国”是燕国，而甲骨文中的“𤯔国”当然也应该是燕国，不过，它是指西周以前的古燕国。

古燕国和商王朝有密切的联系，甲骨文中常见有“𤯔来”的卜辞。所谓“𤯔来”，即指𤯔国之人到商王朝来。甲骨文中对此事进行过多次占卜，说明他们之间的往来是比较多的。甲骨文中还常见有“妇𤯔”的名称，所谓“妇𤯔”是指𤯔国之女嫁于商者，可见𤯔国与商王朝

不仅彼此往来而且还互通婚姻。

燕地产白马，在文献和甲骨文中都有记载。

甲骨文中有卜辞：“贞，𠄎乎取白马氏”。可见，𠄎国地区不仅产白马，而且还以白马作为向商王朝交纳的贡物。

商王朝是黄河流域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因此有些小国依附于商。𠄎国，就是北方臣属于商的一个小国。

古燕国灭亡的时间，大约是在商末周初。《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北燕”就是“燕”。“燕”，既是国名又是地名，称其国即是古燕国，称其地，则为燕地，国名与地名一致，这在古代是常见的现象。

召公为周之同姓，一直活动在陕西渭水流域。它与北方燕地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由于周武王灭商之后，为了统治北方才将他封在这里。召公被封于燕后，以地名为国号，沿用俗称，将自己所建的国家称为燕国，这就是西周时的燕国。此后，在古文献中再也不见有关古燕国的记载。古燕国的灭亡，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它很可能被西周的武装力量征服了。

二、夏商时期北京地区的经济

农业和畜牧业 要了解夏商时期北京地区的经济情况，这要依靠考古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的范围很广，但在北京地区所发现的遗址和墓葬，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以下几处：昌平县雪山村，平谷县刘家河、房山县琉璃河等。根据以上的发掘资料可以看出：夏商时期居住在北京地区的人们，过的是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例如，在平谷县发现的一座商代居住遗址，出土了大量陶片和少量石器，以及一些兽骨，据研究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定居生活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在其他遗址里所发现的石器中有石刀、石镰等农业生产工具，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简单情况。

除农业生产外，当时的人们还进行狩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些遗址里，还发现了细石器和兽骨，这说明畜牧业和狩猎在当时还占有一定的地位。

手工业 夏商时期，北京地区手工业种类繁多，产品的种类主要有石器、陶器、金器、青铜器等，这些器物在考古发掘中都有实物出土，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现的陶器以夹砂陶居多，泥质陶较少。制陶方法为泥条盘筑、模制和手制几种。一件陶器往往兼用几种制法，说明当时制陶技术已相当进步。陶器的种类有：炊器，以鬲、甗居多，鼎次之。盛贮器，以盆、碗、罐、瓮居多，也有豆，鬲等圈足器。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最重要的是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在刘家河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成套的青铜礼器，计有小方鼎、弦纹鼎、兽面纹鼎和鬲、甗、爵、卣、斚、盃等，其中最精美的是三羊罍和龟鱼纹鸟柱铜盘。在刘家河墓葬中还出土了铁刃铜钺一件，刃部已锈蚀，残长8.4厘米，阔宽5厘米。直内，内上有一穿孔，孔径一厘米。刃部之铁为陨铁锻制而成。

这种铁刃铜钺是稀有的古代遗物，在考古发掘中很少见，到目前为止，全国只发现了三、四件。铁刃铜钺的发现，说明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北京地区的古代人们对铁的性质已有了初步的认识。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还出土了一批别具特色的装饰品。如琉璃河夏家店下层

文化墓葬中发现了铜耳环、铜指环；在昌平雪山三期文化遗址中不仅发现了铜耳环，还发现了金耳环；在平谷刘家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也发现了金耳环、金臂钏、金发笄等。可见，当时的人们不仅掌握了制造铜器的技术，而且也掌握了制造金器的技术。这反映出当时的手工业生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第三节 西周春秋时期的燕蓟古城

一、武王灭商与周初封燕

周初分封与燕国的建立 西周时期，是中国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建立西周王朝。为了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周武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实行分封制即其重要措施之一。所谓分封，就是周天子把自己的子弟、亲戚、功臣和古代先王圣贤的后裔等，分别授予一定范围的土地和人民，建立统治据点，以拱卫周王室，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①。“封建”乃是封建建国的意思，受封者接受周天子的封赐，以后就成为占据一方的诸侯。他们要对周天子承担一定的义务，以起到捍卫王室的作用。

西周初年，分封了许多国家，《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荀子·君道篇》记载：西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实际上不只此数，有的古书记载周初封国达四百余国，服国八百余国。西周春秋时期的几个重要国家，都是周初分封的。如：封姜尚于营丘，国号齐；封周公旦于曲阜，国号鲁；封叔虞于唐，建唐国（后改为晋）。北京地区的燕国也是在这时分封的。

燕国姬姓，是召公奭的封国。这是西周王朝分封在北方的一个大国，其活动中心就是现在的北京地区。关于召公奭封于燕的情况，史籍有如下记载：

《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集解》引谯周曰：“周之支族，食邑于召，谓之召公。”《索隐》曰：“召者，畿内菜（采）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后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

《谷梁传》昭三十年：“燕，周之分子也。”

这些记载说明，召公奭为周之支族，姬姓，因其食采于召（今陕西岐山县西南），故称召公。周武王灭商后，将他封于北燕，建立燕国，地在今北京一带。但具体在北京什么地方，由于文献记载不一，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解决。解放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为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弥补了文献的不足。

琉璃河商周遗址与燕国始封地 近年来，考古学家在房山县琉璃河乡董家林等地，发现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商周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一般意见认为，这个遗址应该就是周初燕国的始封地。

这个遗址占地广阔，规模宏大，内涵十分丰富，绝非一般居民点可以与之相比拟的。遗址的范围，包括琉璃河乡北部的涸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等地。其东西

^①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长约三点五公里，南北宽约一点五公里，整个遗址面积约为五点二五平方公里，而京广铁路又从遗址中穿过。这个遗址分为居住址、墓葬区、和古城址三个部份。考古工作者在居住址发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遗迹，如：房子、窖穴、陶窑及各种遗物，如陶器、骨器、蚌器、石器等，还出土了未刻字的卜骨^①。

在墓葬区，埋有大量墓葬，仅就目前已经发掘的就有二百余座，其中有大型墓、中型墓和小型墓三种。小型墓一般长2.5米左右，宽1.2米左右，墓中随葬品很少。中型墓一般长3.5米左右，宽为2米左右，葬具为一棺一槨，随葬品比较丰富。大型墓则迥然不同，其规模很大，形制也和中小型墓不一样。例如，1046号墓有一墓道长11.8米，将墓道、墓口计算在内全长为16米。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墓口长为4.2米，宽2.8米，墓底距地表深为8.7米。整个墓道内的填土都经夯实，质地坚硬。墓室内置大型木槨一具，但其被盗，遗物几乎荡然无存，只残留了少量的蚌片、贝和破碎的小件青铜器以及玉器残片。

此墓还有一个陪葬坑，即1100号车马坑。此坑南北长6.1米，东西宽5.7米，坑底距地表深为1.9米，坑中共葬马十四匹，车五辆。人死后随葬车马，这是显示贵族社会身份的表现，并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随葬车马数量的多寡，显示着死者生前社会地位的高低。此坑随葬车马的数量是比较多的，这说明，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应属于燕国的高级贵族。

总之，琉璃河遗址，绝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考古遗址。它不仅面积大，而且内容丰富，有居住址、城址、大型墓葬。似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遗址，作为燕国始封地来说，是完全相称的。

不仅如此，从时间范围来看，琉璃河商周遗址中的西周早期文化，与周初封燕的时间亦是相当的。仅就墓葬情况而言，目前在这个遗址中发掘的有商代和西周两个时期的墓葬，在西周的墓葬中，时代最早的是周初的成王前后。根据《史记》记载，周王朝建立后二年武王病死，由成王继位。可见，成王以前的西周历史很短，仅有两年时间，而琉璃河遗址中的周文化年代是从西周成王前后开始的，显然这与周初封燕后在今北京地区建立燕国的时间也是完全符合的。

再从出土铜器的情况看，在遗址中集中地出土了大量贵重的西周青铜器。享有这些铜器的主人，当然是一些具有重要政治地位的人物，同时也可估量出这个地区在当年也应具有与之相应的政治地位。尤其重要的是在这里出土了很多带有“匱侯”铭文的铜器，比较著名的有伯矩鬲、复尊、复鼎、攸簠、董鼎等，在有的铜兵器上带有“匱侯”铭文，如：“匱侯舞戈”、“匱侯戈”，还有的铜泡上有“匱侯舞易”的铭文。目前已经可以确定，所谓“匱侯”即“燕侯”，就是西周王朝分封在今北京地区的燕国的国君。带有“匱侯”铭文铜器的大量出土，绝非偶然现象，它证明，这个地方曾经是属于燕国的封地，而且有的铭文还明确记有“太保”二字，如“董鼎”铭文：“匱侯令董饒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董贝，用作太子癸宝尊鬲”。这显然是“太保”在位时的器物，此“太保”即“召公奭”，也就是《史记》所载“封召公于北燕”的召公。他是燕国的开创者，周初曾任“太保”之职。

从以上情况看出，今北京琉璃河地区实为周初燕国的始封地。确定了这一点，解决了多少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今天，已经不能离开琉璃河遗址而去探讨燕国始封地的问题了。

^① 郭仁、田敬东：《琉璃河商周遗址为周初燕都说》，载《北京史论文集》第一辑。

西周初年，周王朝为什么将燕国封在今北京地区呢？

从政治、经济、地理位置等方面的条件来看，这里是北方及东北各族南下的必经之路，北方各族经北京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可直达中原地区。古代南北各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及政治上的联系，都是通过这条路线进行的，而燕都所在，正是这条路线上的枢纽。再从西周王朝的统治考虑，今北京一带又是西周王朝应该长期镇守的北方重镇。

从历史条件来看，在周初封燕之前，很早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活，至商代末期，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小国。因此，燕国势力到来之后，并不是在荒无人烟的地区建立国家政权，而是在原有小国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对于这个问题，郭沫若早就提出这样的看法。他认为，燕国的历史决不始于周初，而是早已有之，燕“系自然生长的国家”。现在看来，这个论断是符合历史情况的。

燕地古城遗迹 西周初年，燕国势力到来之前，这里确曾有过一个小国，经考古发掘，在今北京琉璃河董家林村曾发现了一座古城址。这座城址东西长850米，城南部由于大石河泛滥冲成洼地，所以南北长度不清。城的结构有主墙、内附墙和城外平台。主墙宽约2.6米，内附墙在主墙内侧，紧贴主墙面；城外平台在主墙外侧，低于主墙，呈平面状。此城为夯土板筑而成。在城外的周围，除南面外，东、西、北三面均有护城河。可见，这是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古代城址。

城墙的建筑年代是比较早的，经试掘，有两座商末周初的墓葬打破了城墙夯土，表明城墙的时代早于墓葬。因此可以断定，此城始建的年代，最迟不会晚于商末周初。另外，据参加发掘的同志称：“该城的结构，与河南郑州商城的结构基本相同，……那么，董家林古城的建筑年代，亦应与郑州商城相差不多”^①。综合以上情况分析，此城的正式使用时代大约是在商代后期^②。

董家林古城的建筑年代既然在商代后期，那么作为西周分封的燕国以前，这里又是哪个国家的城址呢？据《史记》记载，召公所封之地，原名叫“燕”。如《史记·周本纪》云：“封召公奭于燕”，《燕召公世家》云：“封召公于北燕”。“北燕”也就是“燕”。此“燕”字既是地名又是国名，称其地则为“燕地”，称其国则为“燕国”。然而，这里所说的“燕国”还不是西周召公受封后所建的“燕国”，它是在西周势力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当地的一个古国。因其名为“燕”，可称之为“古燕国”。武王灭商之后，西周吞并了这个古国，并占领其地，在这一带建立了西周的封国。因为当地古称“燕地”，西周沿袭旧俗，在这里建立的国家，仍称为“燕国”。这才是召公受封所建的西周时期的“燕国”，原来的古燕国已灭亡了。

今在召公始封地琉璃河董家林村发现的古城址，其废弃的年代也是在商末周初。再结合其他条件考虑，这个古城址应该就是西周以前存在于当地的古燕国城址的遗存。

燕与蓟 与周初封燕的同时，文献也记载了周初封蓟的情况。

《史记·周本纪》载：“封帝尧之后于蓟”。

《礼记·乐记》载：“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

这里明确记载，“蓟”也是周初分封的一个小国。

关于蓟国的历史，以及它与燕国的关系，《史记·周本纪·正义》记载：“蓟燕二国俱

①② 参阅郭仁、田敬东：《琉璃河商周遗址为周初燕都说》。

武王立，因燕山薊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薊微燕盛，乃并薊居之，薊名遂绝焉”。

按照唐代张守节的这个说法，薊是被燕吞并了。此说影响较大，但其是否可靠，现在却难以考定。然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自西周中期以后，在现存文献中再未见到有关薊国活动情况的记载。由此推断，薊在西周早期就被燕国吞并的说法，可能有一定的史实根据。

薊国的始封地在哪里，这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水经·湿水注》载：“湿水又东北过薊县故城南——昔周武王封尧于薊，今城内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

北魏酈道元在这里指出的薊城位置，在今北京城区的西南部。1974年，在这里发现了残城墙遗址，当是酈道元在《水经》中所说的薊城。但经考古发掘，残城遗址下面压着一座东汉晚期墓葬，表明此城的时代是在东汉以后^①，还不能把它当作西周初年的薊城。因此，关于西周时期薊城的地理位置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与探讨。

二、西周时期燕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了解西周时期燕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主要依靠考古资料。目前在北京地区发现的西周时期的考古资料，除了一些零星的发现以外，比较重要的有两个地点：一是房山县琉璃河的商周遗址；一是昌平县白浮村西周木椁墓。

琉璃河商周遗址，包括墓葬区、居住区和古城址三个部份，内涵十分丰富，出土器物很多，昌平白浮村主要发现了西周墓葬，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重要的有青铜兵器、工具、车马饰件，还有陶器、石器、象牙器和玉器等，现依据这些资料来研究当时经济、文化的情况。

当时的经济生产，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

农业生产和商代相比，没有什么突出的变化，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房山县刘李店、董家林出土了殷周时期的石杵和石镰。石杵已残，但顶部非常光滑。石镰以青石磨制而成，已残缺^①，表明当时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依然是以石器为主。

手工业的发展却很显著，门类也很多，除陶器、石器外，比较突出的有玉器、漆器、青铜器等。

青铜器 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很多，有鼎、鬲、甗、尊、卣、簠、觥、盘及各种青铜武器、青铜工具等，其中著名的有：

“攸簠”，琉璃河商周遗址53号西周燕国墓出土。其造形奇特、纹饰华丽，器腹上有对称的象首耳，圆形器座下边有三虎鼎立，器腹和器盖上为凤纹，器盖和器内底有铭文。铭文记载了作器者“攸”，因受到匚侯赏赐贝三朋，为显示荣耀而作了这件簠。

“董鼎”，琉璃河253号墓出土。器高62公分，重41.5公斤，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商周青铜礼器中最大的一件。此鼎为三足圆腹双耳鼎，体态浑厚凝重，纹饰壮严古朴，器内壁刻有四行二十六字铭文。铭文记载了匚侯派“董”到宗周见太保，受到太保的赏赐，董为纪念此事以显示荣耀而作了这件鼎，从价值上来看，实为周初重器。铭文中的大保就是封于北燕的召公奭，“匚侯”就是代召公就封于燕的召公元子，即第一代匚侯。

^① 参见赵其昌《薊城的探索》。

^② 北京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3期。

“伯矩鬲”也叫“牛纹鬲”，因器身、器足、器盖及器组，均以牛头纹作装饰而得名。在雕刻艺术上不仅有浮雕也有立体雕，整个器形完整和谐，有高超的艺术水平。

这些铜器，不仅标志了当时青铜制造的水平，而且许多铜器铭文又成为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带有“匱侯”铭文的铜器，对北京史的研究更有极珍贵的史料价值，如：

“董鼎”其铭为：“匱侯令董僕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董贝……”。

“复尊”其铭曰：“匱侯赏复冕、衣、臣、妾、贝，用作父乙宝尊彝”。

以上铭文中的“大保”系指召公而言，“匱侯”即指燕国的国君。据此可知，这几件铜器都为燕国铜器，代表了当时青铜制造的水平。

带有“匱侯”的铜器不仅出在琉璃河遗址一个地区，另在其他地区也屡有发现。除传世品有“匱侯旨鼎”、“匱侯旅盂”外，还有传称出自北京芦沟桥的“亚盃”和出自山东济宁梁山的“伯盃鼎”。然而值得注意的还是远在辽西地区的发现。早在1955年在辽宁凌源马厂沟发现了一批商末周初的铜器，其中有一件“匱侯盂”，这表明西周初年，燕国的势力已到达大凌河流域。1973—1974年，又在辽宁马厂沟附近的喀佐北洞村和山湾村，先后发现了三批商周铜器，其中山湾村出土的“伯矩鬲”和北京琉璃河出土的“伯矩鬲”，可能是一人之器，据同坑“匱侯盂”可以推定为西周初年之器。

近些年来，在辽宁朝阳魏营子曾先后清理了九座西周时期的土坑木椁墓，其墓结构与北京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相同，残存的殉葬品中还有铜盃、銜铃等车马器。这说明早在西周初年燕国的势力已达到辽西地区，并说明辽西出土铜器的地点很可能是燕国经略东北地区的重要据点①。

总之，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不论从器物造形之精美、还是从铜器出土数量之大、出土范围之广泛，都可反映出当时青铜制造业不仅技术水平高，而且青铜制造业的规模也是很大的。

漆器 在琉璃河西周燕国墓中出土的漆器种类很多，计有豆、觚、鼎、壶、簋、杯、盘、彝等，以豆居多，均为木胎。器胎一般较厚重，器表皆有漆绘，有些还用蚌片等镶嵌起来，与彩绘共同组成装饰图案，可见其工艺技术是很进步的。

玉石蚌器 在琉璃河西周燕国墓中，出土了玉、石、玛瑙和料质装饰品，有些是用线穿起来的串饰，有的似固定在纺织品上，有的可能是单独的佩饰。M1093号墓中出土的串饰是白色的石管、石珠、玉片和红色玛瑙珠穿接而成。其中一方形玉片上刻有云纹，中间有孔，有的玉片上刻蝉纹，制作都很精细。有些墓葬还出土了带有动物形象的玉饰，如：琉璃河54号墓出土玉鱼四件（其中二件为白玉圆体状，二件为青鱼片体），玉鸟二件，玉蚕一件，另外还有51号墓出土玉环一件；51号墓和53号墓各出玉柄形器一件，作长条形，状似琴，一端束腰并有两道凸棱。

石串珠在22号、51号、53号、54号墓中均有出土，是殉葬奴隶的项饰，用黑色蛇纹岩制成，制作较精细，钻孔规整，这些串珠中常有骨制者，除此之外，如蚌饰、刻花牙饰等，都显示了当时制作技术水平是比较高的。

西周带字甲骨 1975年在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地，出土了不少卜甲和卜骨残片，在两

①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

座墓中还发现了带有文字的甲骨，如：

M₂：在人骨左上方发现数十片卜甲，其中有两小片刻有文字，一片刻有“贞”字，另一片刻有“不止”二字。

M₃：在椁室右侧发现很多破碎的卜甲残片，数量较多，约在百片以上，有的刻有“其祀”二字，另一片刻“其尚上下韦驭”几个字。

卜甲所用的龟甲，有腹甲也有背甲。卜甲都经过整治，凿成方形平底的浅槽，槽孔排列整齐，有灼痕，字形比较小，接近商代晚期甲骨的风格。

过去发现的带字甲骨(甲骨文)，主要是在殷墟发现的，都是商代遗物，至于西周带字甲骨，发现的数量远比商代少得多，出土西周带字甲骨数量最多的地点是陕西的歧县凤雏村，共出土二百多片，此外其他地方也有零星发现。今北京地区发现了西周的带字甲骨，它不仅是珍贵的文物，而且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西周时期的奴隶殉葬墓

在奴隶社会，奴隶是不被当作人看待的，奴隶主对奴隶可以任意虐待和杀害。这种情况在北京地区有关西周时期的考古资料中也有明显的反映，现介绍几座奴隶殉葬墓和车马坑，以便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琉璃河22号墓：殉葬者被埋在棺椁之间的夹缝里，这个奴隶是个十三、四岁的男性少年，他是被捆绑了手脚以后埋葬的。在这个奴隶的尸骨上还散布有一些车马的铜饰件，如辖、镢、銜等，把车马饰件置于奴隶身上，这充分说明奴隶主把奴隶与牛马是同样对待的。

琉璃河52号墓：墓内殉葬奴隶一人，是十二岁左右的男性少年，被捆绑了双手放在墓主脚下二层台上。

琉璃河53号墓：墓内殉葬奴隶二人，均放在墓主东侧的棺椁之间，一人头向南，是九至十岁的男性(?)，颈部有一组串珠，头上有一把青铜剑，腰间有一把青铜削。另一人头向北，是十三、四岁的少年(性别不详)，颈部也有一组串珠，腰间置戈、矛、剑各一件，又有一组七件组成的兽面形铜盾饰，两个殉葬奴隶的下肢叠压在一起。

琉璃河54号墓：这座墓共殉葬奴隶二人。一在墓主西侧的棺椁之间，另一个在墓主的东侧，也是在棺椁之间。东侧埋葬的是一名十五岁左右的青年(性别不详)，骨架已散乱，颈部有一组串珠。在墓主西侧埋葬的是一名十七、八岁的女性，整个颅骨完整无缺，颈部有一组串珠，头前有一堆蛤蜊壳，值得注意的是在头骨的左额角上有一个枣大的圆洞，吻部大大地张开着，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奴隶是在头遭重创的情况下呼号而死的。

奴隶主贵族生前压迫剥削奴隶，死后仍想过寄生生活，因此，这些殉葬墓就成为奴隶社会阶级压迫的真实写照。

车马坑 用车马殉葬，是奴隶主贵族显示权势与地位的象征。西周时期的车马坑，在北京地区均发现在琉璃河遗址，目前已发现二十多座，大小不等，其中最大的是1100号车马坑。这个坑是1046号墓的陪葬坑，坑口接近方形，南北长6.1米，东西宽5.7米，坑底距地表深1.9米，坑中共葬马十四匹，车五辆，所有马匹都是头向北，侧卧于坑底，马骨架排放整齐，据此推测是杀后葬入墓坑的。在车马坑中也有用奴隶殉葬的现象，在琉璃河53号墓前陪葬的车马坑里，有一车、六马、二犬，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奴隶被埋在车后，他的双手只